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茅家琦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茅家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6830

人民出版社

986830

封面设计：倪天煦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TaiPingTianGuo DuiWai GuanXiShi

茅家琦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82,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100

书号 11001·635 定价 1.40 元

序

茅家琦同志于五十年代后期展开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曾主持编辑了几辑对太平天国史新探的集子。一九八〇年，出版了他与方之光、童光华两同志合著的《太平天国兴亡史》，给人以清新之感。

现在，茅家琦同志研究多年的专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又完稿了。他搜集了丰富的外文资料，不憚辛劳加以翻译，例如叙述美国公使麦莲探访天京事，翻译了《1854年6月1日法斯就漫游天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给麦莲的报告》。^①对所用的外文资料除亲自翻译外，还一一加以考核，例如叙述英国公使约翰·包令派麦华陀和卢因·包令探访天京，则翻译《1854年6月29日麦勒西舰长就英国宗教教义给太平天国东王的复照》，并采取我国著录金石文的优良传统写了长篇《跋》文，对内容加以考核。^②对书中要叙述到的重要人物则先写成传略，如洪秀全曾向之学习基督教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写了《洪秀全和罗孝全》。^③对书中的重要论点，则先提出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以收集思广益，如《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④《太平天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⑤

① 见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太平天国史研究室合编的《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

② 见《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③ 见《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④ 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⑤ 见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太平天国史研究室合编的《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一辑。

等等都是。今天，这部《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便是从这种长期探索、辛勤努力取得的成果，首先使我肃然起敬。

承茅家琦同志好意，在发排前，给我得先读为快。我怀着学习的心情，读了这部专著，得到了几点很深的感受。

第一，从资料看，记载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中文记载十分缺漏，外文资料却有丰富的记载，故研究这一专题，非掌握外文资料不可。本书引用了丰富的外文资料，其中包括：（一）1971—72年间英国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国会文书：中国》（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China），第42卷。（二）1973年美国威明顿学术资料公司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第一套，1842—1860》（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 1842—1860），第4、5、6、7等卷。此外，还从一些外文专著中转引了若干重要资料，其中包括：（一）1971年出版的邓嗣禹写的《太平叛乱和西方列强》

（S. Y. Te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二）1969年出版的格雷戈里写的《大不列颠和太平天国》（J. S. Gregory, Great Britain and Taiping）。由于根据了丰富的外文资料，因此，对一些问题的阐述就得到具体、清楚。例如，对马沙利、麦莲、卢因·包令、麦华陀等人在天京等处搜集情报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如何对付中国农民革命问题上的各种阴谋和意见，揭露得充分。

第二，在一系列观点上，著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著者认为，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特别是英国侵略者和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一时无法调和。外国侵略者要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清王朝则坚决拒绝。因此，外国侵略者除采取“中立”政策外，别无其他选择。

著者认为，这种“中立”政策，实际上是“武装中立”政策。对触犯外国侵略者在华利益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报复，著者用专章以上海小刀会和广州天地会起义遭到外国侵略者的镇压和破坏为例，论证这个论点。

(二)在执行“中立”政策的同时，外国侵略者在和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过程中以及在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为了从清政府手中取得更多的特权，多次提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问题。著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诱饵，一根“筹码”，即使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一年间，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公开武装镇压中国农民革命的条件也没有成熟。著者认为，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是在一八六二年元旦紫时雍覆照宾汉，严正拒绝英国侵略者提出不进攻上海等地等无理要求以后。这时，外国侵略者采取谈判手段，从太平军手中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没有了；要实现北京条约，就必须镇压太平军。从清朝方面说，反对“借师助剿”的咸丰皇帝死了，肃顺等也被慈禧太后、奕訢等搞掉了。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的条件具备了。

著者还认为，即使在这时，外国侵略者直接出动武装镇压太平军的地区仅限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此外的地区，他们不愿自己出兵，而是利用“常胜军”。

(三)著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是外交政策的主流”，但是，太平天国在处理对外事务问题上也有错误和教训。他们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曾经漫不经心地把国家主权出让给西方列强，外国兵舰不受阻挡地沿江西上。太平天国实际上已经把内河航行权给了西方列强。

著者认为，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错误

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利用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长期存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阻止两者相互勾结，反对自己，使外国侵略者长期保持“中立”，使自己集中力量打击清王朝。这个错误又集中表现在处理进攻上海问题上。著者认为，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在清王朝垮台以前，暂时维持允许上海现状，等到攻下清王朝的首都以后，再来解决上海问题。这是上策。此外，还有中策，即下决心集中兵力，一举而拿下上海，使外国侵略者措手不及。这在当时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打下上海以后，太平军在继续攻击清王朝的同时，还要分出兵力在上海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因此，我们说，这是中策。可是，太平军选择的却是一条下策：即出兵打上海，又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受到阻力，戛然而止。退而复来，来而又退。三打上海，没有给外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反而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弱点，促使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

著者不同意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办好外交，但是，著者认为我们也不能否认太平天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的困难。

以上一系列看法，著者都是在坚实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其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由于对外关系的结论是正确的，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关系的分析是翔实而明确的，论太平天国对外应采取的政策也是对的。其中有些分析如太平天国曾否争取外国侵略者的中立，和在为着维持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到了屈辱的时候而断然以兵戎相见是否错误，以及未能把外国侵略者逐走的原因何在，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再加探索。而全书处处表现出既有“新见”，又复“平实”。“新见”之中见“平实”，“平实”之中寓“新见”，这是治史不易达到的境界。本书充分地反映了著者的学术修养。

第三，著者态度严肃，他对所叙述的史事都进行了考证。例如，对世所传一八五三年洪秀全邀请罗孝全到天京传道的信，根据英译本认为不符合洪秀全身分和太平天国礼制，在名字上还盖有一颗“天德太平王印”，是不可信的。著者剔除了伪假的资料，保持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他是疑而必考，信而后述。他治史的态度，就是如此地认真、严肃、负责的。

又如传教士艾约瑟到天京后，曾经通过蒙时雍向洪秀全送去一篇题为《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的文章。洪秀全对这篇文章进行评点、删改、并改了题目，退回给艾约瑟。原件存英国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肖一山辑的《太平天国诏谕》加以影印。由于字迹模糊，肖一山在考释中说洪秀全改的题目是《上帝金颜体神不得见论》。著者根据多种材料考证确定洪秀全改的题目是《上帝圣颜惟神子得见论》。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考证。因为，假如同肖一山所考，则与洪秀全自始宣传上天受命、下凡救世的说法根本相反，使人对太平天国刊布的书这种说法成为不可理解，使人对国外传教士与洪秀全的争论和辱骂也都成为不可理解，而对太平天国究竟是利用宗教作为工具来发起革命呢，还是如同有些人所说是一场宗教革命呢，都起了惶惑。今得著者确凿有据地考明，则一切惶惑都冰消瓦解了。这对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以至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作出了大贡献。

第四，从全书的体裁看，著者具有突破常规的精神。这是一部专著，一部史书。史书与考证文、议论文都不同。但本书对所用资料都先经过严肃的考证，撰写又夹叙夹议，实兼有考证文和议论文之长。本书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历史专著，也不同于现今的历史专著。读了本书，绝没有感到材料的堆砌，却恰恰是到处感到内容充实丰富。而在展开充实丰富的历史事实后，出之以简短、扼要、明快、朗爽的叙述和论断。读之使人心旷神怡。本书别开生面，著者

勇于创新，也敢于继承，具有突破常规的精神。

我读了茅家琦同志这部专著，使我对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错综纷纭的情况中，得到瞭如指掌的观感。今天，把我的学习笔记写出来，向列位同志请教。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里，教导过我们说：“即使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①家琦同志这部专著，正是“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成果。我虔诚地、热切地祝愿我国史学界同志们大家锲而不舍地、冷静而沉着地努力去多多写出好的史书，在史学的园圃里，开出万紫千红的鲜花，结出满园丰硕的成果，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0267/12

目 录

序	罗尔纲(1)
第一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外关系	1
第一节 清政府和英、法、美的关系	1
第二节 清政府和沙俄的关系	7
第二章 金田起义在国际上的反响	10
第一节 金田起义爆发	10
第二节 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政府官员对金田起义的反应	14
一、西方传教士的反应	14
二、西方商人的反应	21
三、西方国家官方人士的反应	23
第三节 金田起义在俄国引起的反响	28
一、穆拉维约夫企图“趁火打劫”的《条陈》	28
二、彼得堡的活动	31
第三章 一八五三年间外国使节在中国的活动	34
第一节 英国公使文翰的活动	34
一、派遣密迪乐到苏州、常州一带刺探军情	34
二、文翰到天京活动	37
三、文翰对太平天国的政策主张	46
第二节 美国公使马沙利的活动	53
一、去天京未成	53
二、和清两江总督怡良会晤	56

三、马沙利和培理的对华政策主张	59
第三节 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的活动	65
第四章 一八五四年间外国使节在中国的活动	72
第一节 美国公使麦莲的活动	72
一、麻西给麦莲的训令	72
二、麦莲到达镇江、天京、芜湖等地	74
三、美国官员的情报活动	81
四、麦莲给麻西的《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	90
第二节 英国公使约翰·包令的活动	95
一、约翰·包令代替文翰任驻华公使	95
二、麦华陀和卢因·包令在镇江、天京的活动	97
三、麦华陀和卢因·包令给约翰·包令的报告	105
四、约翰·包令的对华政策主张	109
第五章 从上海和广州看英、法、美的“中立”政策	112
第一节 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	112
一、营救清苏松太道吴健彰	113
二、对小刀会进行严密封锁	117
三、对起义军的进攻和诱降	122
四、外国干涉者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特权	129
第二节 破坏广东天地会起义	134
一、策划干涉起义军的一份备忘录	134
二、对待起义军和清朝政府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139
三、出动炮舰，公然镇压起义军	144
第六章 四国条约和太平天国	147
第一节 “修约”活动中的一根筹码	147
一、克拉兰敦给约翰·包令的《训令》	147

二、怡良和麦莲在崑山会晤	151
三、崇纶、文谦和麦莲、约翰·包令在天津的会谈	154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	160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修约”活动的继续	160
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	164
三、沙俄活动的特点	170
第三节 法、俄扬言“助剿”	173
一、法、俄公使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出兵“助剿”	173
二、清朝大臣们对接受“助剿”的争议	176
第七章 一八五八年太平天国和额尔金的接触	181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	181
一、农民革命的高潮	181
二、天京内讧后洪秀全力挽危局	183
第二节 额尔金闯入长江	185
一、英国的视线转移到长江	185
二、太平天国想和额尔金拉关系	189
第八章 太平军向东南进军后外交史上发生的 几件大事	195
第一节 太平军逼近上海	195
一、太平军攻克苏常	195
二、李秀成一打上海	196
第二节 何伯、巴夏礼在长江流域	198
一、太平天国同意何伯关于太平军“一年内” 不进攻上海的要求	198
二、巴夏礼在黄州阻止陈玉成进攻武昌	204
第三节 富礼赐、司百龄、宾汉在天京	207

一、富礼赐在天京的活动·····	207
二、司百龄取得了航行长江的权利·····	210
三、太平天国拒绝了宾汉关于太平军继续 不进攻上海的无理要求·····	211
第四节 刁乐德克、夏福礼等在宁波·····	219
一、外国侵略者阻止太平军攻打宁波·····	219
二、太平军攻克宁波后外国侵略者的挑衅 活动·····	224
第九章 外国侵略者公开镇压太平军·····	231
第一节 英国侵略者决心出兵镇压中国革命·····	231
一、镇压中国革命的酝酿过程·····	231
二、外国侵略者内部的反对意见·····	237
第二节 清政府决心“借师助剿”·····	240
一、清王朝中央政策的变化·····	240
二、清王朝地方大吏和士绅的意见·····	244
第三节 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军的方式的选择·····	249
一、将太平军从上海四周打出去·····	249
二、攻打宁波·····	254
三、利用“洋枪队”协助清军打击太平军·····	255
第四节 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教训·····	265
第十章 外国传教士和太平天国的往来·····	271
第一节 戴作士到镇江·····	271
第二节 上海外国传教士到苏州·····	273
一、忠王李秀成在苏州接见传教士·····	273
二、干王洪仁玕邀请传教士访问苏州·····	278

第三节 罗孝全和天王洪秀全·····	281
一、一八五三年罗孝全去天京未成·····	281
二、一八六〇年罗孝全到天京·····	292
第四节 艾约瑟在天京·····	297
一、艾约瑟妄想把拜上帝教纳入基督教的轨道·····	297
二、艾约瑟和天王洪秀全的笔战·····	302
第五节 其他外国传教士在天京的活动·····	305
一、花兰芷·····	305
二、杨笃信·····	309
三、慕维廉·····	311
四、觉士·····	314
五、卢卫廉·····	316
附录一 大事记·····	319
附录二 参考书目举要·····	330
附录三 人名索引·····	346
后记·····	352

第 一 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清政府和英、法、美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①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中国作为它们掠夺的对象。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清王朝和英、法、美三国签订了江宁、黄浦、望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后，外国侵略者的贪欲暂时得到满足。可是，不久，它们发现事态的发展并不如它们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他们在中国遇到了麻烦。

在通商方面，他们原以为中国的市场可以大量地吸收外国的工业制造品，中国的廉价原料可以大量地被他们掠夺。那位代表英国政府在《江宁条约》上签字的璞鼎查(H. Pottinger)先生就

① 《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曾经向英国商人表示:《江宁条约》给英国开辟了一个广大的市场,即使开动兰开夏(Lancashire)的全部纺织工厂也不足以供应中国一个省的需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战后,五口相继开放。上海港是在一八四三年十一月通告开放的。它的对外贸易的确逐步繁荣起来。据统计,上海港进口货物的货币总值,从一八四六年的 5,117,625 元,增加到一八四九年的 5,804,793 元(不包括鸦片走私进口);出口货物的货币总值,从一八四六年的 7,329,410 元,增加到一八四九年的 8,403,149 元(不包括丝的走私出口)。

就单项商品计算,鸦片走私进口,一八四七年为 16,500 箱,一八四八年为 16,960 箱,一八四九年猛增到 22,981 箱。茶和丝的出口数量增加也很快,逐年增加情况如下表:

年 代	茶的出口数	丝的出口数
一八四三	——	——
一八四四	1,149,000 磅	——
一八四五	3,801,000 磅	6,433 包
一八四六	12,460,000 磅	15,192 包
一八四七	12,494,000 磅	21,176 包
一八四八	15,711,000 磅	18,134 包
一八四九	18,303,000 磅	15,237 包 ^①

上海进口货物,特别是棉纺织品的大量增加,给上海附近的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影响。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的棉纺织业自元末以来就闻名全国,有很大的内销市场。但是,上海开埠以后,英国棉布倾销,打击了当地的土布市场。一八四六年,有人记载松江、太仓的纺织手工业的情况说:“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商贾不

① 以上统计资料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402、403、413页。

行,生计路细。”^①

厦门是在一八四四年六月开放的,当年英国船只的贸易,进口值为372,272元,出口值为58,209元。到一八五二年进口值为1,933,500元,出口值为268,500元。贸易总值也有了增加。

但是,其他三个开埠港口的进出口却是另一种情况。

宁波是在一八四三年十二月正式开放的。一八四四年贸易总值为500,000元。五年以后减到这个数额的十分之一以下。

福州是在一八四四年六月开放的。当年没有外国船只进口。一八四五年贸易总值为375,000元。一八四六年和四七年又没有外国船只进出了。因此,一八五〇年文翰(S.G. Bonham)建议把福州和宁波换成杭州、苏州和镇江。

根据条约,广州也于一八四三年开放。一八四四年进口印度原棉114,068,500磅,一八四九年下降为64,278,500磅。一八四四年出口丝2,604包,茶69,327,500磅;一八四九年分别下降为1,061包和64,677,500磅。^②

正是由于上述进出口贸易停滞的情况,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国外相克拉兰敦(Earl of Clarendon)在给驻华公使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信中对“自从条约缔结以来”,“对华通商的扩展有限”,表示了很大的失望。^③

外国商品输入不能大量增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外通商码头和通商地区的限制,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沉重剥削和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本来就限制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外国资本主义只看到前一个因素,而忽视了后

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第37页。

② 以上数字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5—413页。广州港1849年茶出口为近似数字。

③ 转引自同上书,第764页。